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文化视野

叙利亚——基督教的真正起源地

□ 何　新

许多人以为，叙利亚自古以来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蛮荒沙漠之地。殊不知叙利亚乃是世界最古老文明发源地之一。

叙利亚位于亚非欧三大洲要冲，是亚欧非三大文明发源和交汇之地。大马士革也是丝绸之路衔接长安与东罗马（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枢纽点，是中国历史的西亚之大后院。

传统上的大叙利亚地区，包括今天的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以及约旦，是《圣经》传说中的闪米特人的发祥地。所谓“闪米特人”，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引为祖先的迦南人，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大叙利亚地区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

基督教的创始人、犹太人耶稣，出生在古叙利亚的伯利恒，当时这里与巴勒斯坦都属于罗马帝国的犹太省。耶稣母亲名叫玛利亚，父亲叫约瑟，是叙利亚人。耶稣最早是在家乡叙利亚传教。直到公元七世纪，原生态的本土基督教一直是叙利亚地区的主导文化。后来进入罗马城和欧洲的基督教，其实是次生态的。所以原始基督教就始源看并不是欧洲的宗教，而是亚洲的宗教。

传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就是通过凯桑门进入大马士革的。后来，当保罗被基督教的敌人追逐时，他被教友放在篮子里，从大马士革的城堡上降落在凯桑门，从而逃出大马士革。后遂在这里建有圣保罗教堂，以资纪念。

大叙利亚地区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源地。直到公元七世纪，基督教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导文化。而基督徒心目中的历史重要文物凯桑门和圣保罗教堂依然矗立在大马士革旧城。

据考古发现，叙利亚具有4000多年悠久历史。迄今在叙利亚发现的最古老的遗址可追溯至旧石器时期。靠近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的古代遗址埃勃拉在1975年被发现。埃勃拉似乎一直是圣经所传说的建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东方城邦。

但是，关于叙利亚的古代历史大部分只是传说，古代并没有留下可信的文字历史。其古代历史暧昧不明，现在的说法来自《圣经》和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传说。这些传说包括：

自公元前三千年，叙利亚陆续被苏美尔人、埃及人、赫梯、亚述和巴比伦人所占据。在公元前15至13世纪，这里是赫梯人、埃及人、亚述和米坦尼之间互相争夺的区域，最终亚述帝国控制了叙利亚。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将叙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

罗马将军格奈乌斯·庞培于公元前64年占领安提阿，叙利亚成为罗马一个省。

叙利亚的安提阿是罗马帝国继罗马、亚历山大后的第三大城市。它是一个在上古时代重要的贸易和产业城市，在鼎盛时据说拥有50万人口。

在罗马帝国西部衰落的同时，叙利亚于公元395年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东罗马帝国设置有叙利亚省，包括了今日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大部分叙利亚。

关于“叙利亚”一名，据称最早是在小亚细亚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文艺复兴后发现的伪书）中出现了“巴勒斯坦的叙利亚”这个名字，来描述从今天的黎巴嫩到埃及的广大沿海地区。实际上这个名字可能来自古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

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叙利亚人在中国长安经商。叙利亚的本土基督教流派（聂派）曾经传播到中国。著名的《大秦景教碑》就是用中文和古叙利亚文合并镌刻的。所谓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和古叙利亚。

7世纪以后到16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兴起，叙利亚成为伊斯兰教传播中心之一。由于土耳其和十字军的东征，到1516年叙利亚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18世纪法国侵入，法国宣称叙利亚为保护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法国委任统治。1944年叙利亚从维希法国宣布独立。作为法国的旧殖民地，叙利亚与法国具有某种特殊的历史联系。所以，最近巴黎遭遇恐怖袭击以及法国进军叙利亚，并非偶然。

人物志

“心能转物”的王阳明

□ 张学博

史载，王阳明出生后，到了5岁还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藏书。有一次，一位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更名为“守仁”，之后他就开口说话了。

他志存高远，心思行为不同常人。13岁时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做一个圣贤之人。15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同年，他仗剑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

18岁时，王阳明接触朱熹之学，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弘治十二年（1499年），28岁的他第三次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授刑部主事。七年之后的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任龙场驿栈驿丞。路途中他遭到刘瑾派来的刺客追杀，但他佯装跳水死亡逃过一劫。王阳明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他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43岁之后，他致力于致良知之学。

按阳明弟子钱德洪的见解，《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在这篇文献中，王阳明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这正是王阳明从《大学》直接引出其致良知之学。这也标志着王阳明摆脱了朱熹格物致知之学，直指人心之学。良知本在人心，不必外求，只需去掉私欲，便可自得本心，是故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

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知行合一”，即人的主观认识与实践行为要高度统一。简而言之，认识到了却不实行，不是真正的认识。《传习录》云：“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却不能孝，便知知行分明是两件事。”言下之意就是：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为人子者应该孝顺父母，为人弟者应该尊重兄长，但却不去实践，这样的人不是真正认识到孝道和悌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内心为私人的欲望所遮蔽，因而迷失了本心，导致“致良知”不能完成。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后人称呼王阳明的学说为“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有着很大关系却大不相同。二程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他俩的学说，以“心传之奥”奠定了道学的基础，更以“理”为最高的范畴，因此亦称作理学。二程的学说，特别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朱熹号为集理学之大成，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被当代学者视为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宇宙万物的学说，继承了二程、张载以及邵雍、王安石等人的观点以及当时科学技术的成果，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物组成，“天下之物，未尝无对”，“至微之物，也有个背面”。陆九渊和后来发扬他学说的王阳明均视“心”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心学也”。所以后人也称陆王学派为“心学”。

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世界的本质在于“理”还是“心”的问题。程朱理学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理的体系，作为个体的人需要做的是探求各个事物中的“理”，即格物致知。而阳明心学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一切本在我“心”，其实质是吸收了佛学的思想，即佛学中“心物一元”的思想。所谓“心物一元”，即“心能转物，即同如来”。阳明心学将陆象山的儒学路线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后世影响越来越大。关键一点在于阳明心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张扬人的个性，重视实践，强调积极入世的精神，为后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所欣赏。尽管王阳明出道入佛，对道家和佛学都有相当的修为，但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仍然回到儒家，在儒家之中寻找自身安身立命之所。这一点与北宋理学家张载有共同之处。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其思想皈依之所。这四句话之中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其心物一元的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北宋理学家确有一致之处。阳明晚年又作《朱子晚年定论》，以为朱陆早异晚同。朱子晚年自悔其旧说之非，而自同于象山。

阳明心学影响之大，自然与其事功有很大关联。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学问在事业上充分表达出来。这样的人，王阳明之后400年，才出第二个，就是曾国藩。王阳明用35天时间平定了宁王策划三十年的叛乱。历史上评论道：王阳明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称。王阳明在日本也有极高的声望，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给自己做了一个腰牌，上面写着“一生低首拜阳明”。

他的一生可以用他在前往贵州龙场的途中写的一首诗来评价：“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其境界立现。黄宗羲在读了阳明学说之后感叹：“震霆启寐，烈耀破迷。”

教育视野

互联共享是教育的方向

——来自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的声音

□ 本报记者 曹颖新

2015年11月14日，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2015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近200名代表出席大会。

机制创新汇聚多方力量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讲到：近年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正在加速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重构教育教学生态。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成立的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通过课程重塑，技术管理服务的多方协同创新，以高品质的课程共享引领教学理念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为深化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两年来，东西部的高校直面挑战，支持和鼓励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新手段，参与和创造性地应用优质资源提升教学水平，在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智慧树网发挥了技术平台支持、课程建设服务、教学运营服务等重要的作用。经过两年的发展，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已经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东部高校支援西部高校的概念，而且是东中西部高校之间共享优质资源、共同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教改之路，分享改革成果，是一个共建、共享、共赢的联盟。教育部下一步的行动目标是：鉴于慕课促进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期待在慕课建设和应用的带动下，激发出更多的高校改革，创新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推动教育改革向更加广泛深远的方向发展。

让每一个学生享有最好的课程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谈到：今天的互联网，对于教育来讲，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互动的可能，不再是信息的单向传输，而是信息的互动了。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让老师和学生在远程能够互动起来，有人认为，这种技术在一定意义上会颠覆我们的大学、高等教育，但林建华认为，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这是做东西部联盟、慕课教育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前提。

中国教育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均衡，东部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厚，很多很好的学者都在东部，西部却很缺乏这样的资源。东西部教育资源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我们需要更多地把资源充分共享起来。

做课程共享平台有很多样板，比如edX、Coursara（均为美国高校创建的免费开放在线课堂平台）提供课程使学生可以自由学习。但如果只是提供上网看看视频，这和过去电视大学的课程没什么两样，这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提供互动的课程，必须提供经过严格的管理，能够给学生提供学分，在认证中有用的课程。这是东西部联盟不同于edX、Coursara的地方。

在联盟未创立之时，我们需要有一个把学校、老师和企业，把学校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的模式。也就是说，东部学校、西部学校、老师和企业，都应该有一种共同的目标和愿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课程，最好的管理和体验服务。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西部的学校强烈希望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东部学校的动力在哪里？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东部学校要提升在教学、人才培养中的影响力，但是这还不够，东部学校自身还面临着在教育上的很多挑战，需要通过翻转课堂来提升自己的教育质量。目前来讲，东部学校、课程的提供方还需要认真思考技术变化对教育到底有哪些影响。老师的动力是显而易见的，过去的名师是写作教材，将来的名师应该是有好的慕课，不仅是教材，还要讲得好，才能真正成为名师。

教育部体卫艺司王登峰司长作为北大心理学教授也在参与联盟课程的分享，在会上，他呼吁高校更多关注美育、国防教育和安全教育，并首先培养高素质的公民。与会领导和专家们一致认为，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的影响日益广泛，取得了健康而飞速的发展，彰显了市场化专业服务的全力保障，政府的有力支持和一流大学的责任担当。这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

关公崇拜为何兴盛于两宋

□ 尹传政

崇拜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曾经造就了无数的崇拜对象，三国时期的关羽就位列其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关公崇拜在历史上明显经历了一个过程。

从晋代才开始出现关于关羽的神话传说，但并不那么突出、强烈，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今天所熟知的关羽本人“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英雄形象，在当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桃园三结义”等故事情节也未有丰满。然而，历史发展到两宋，关公崇拜文化才真正兴盛，无论当时社会普通民众，还是封建统治者，都把关公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然，这与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宋政治上的内强外弱是关公崇拜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虽然在北宋建立时赵匡胤就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全面加强政治、经济、军事等中央权力，强化对地方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军阀混战的藩镇割据局面，但在实现中央权力集中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如“崇文抑武”之风盛行。尚武之风日衰的结果是，宋代虽有武举，但却以试策高低定去留，“武举发，先阅射骑，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使得对武士的选拔重文轻武，弱化了军事指挥者。另一个后果就是致使军备长期被忽视，“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再者，军队腐败滋生，军中之人多参与经商。以范仲淹为例，“在庆州，日亦借随军库钱回易”，将回易到的利息“充随军公用支使”；九江巡尉司“常获贩私茶人，乃是本军出戍官兵”。在这样的情形下，北宋不得不面对军事作战频频失利，自身政权持续弱化，西夏、辽、金及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强势崛起，不断蚕食中原的现实。

两宋国家领土长期分裂的现状又推动了关公崇拜文化的兴盛。军事上的失利带来了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和百姓流离失所。如宣和末，燕云战事起，北方边界诸镇的兵祸连结，当地百姓纷纷“弃产而居京师”。在饱受连年征战、国家分裂的痛苦下，人民对收复失地和安定生活产生了强烈愿望，“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虽然寇准进行坚决抵抗，岳飞、韩世忠等人一度收复大片领土，但这些努力在腐败无能的政府面前都是杯水车薪，难以改变失败的命运，终以“澶渊之盟”苟安一方。面对这种局面，民众不由得产生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就是我所依赖的东西”的心理，增强了对英雄的渴望，帮助他们收复失去的家园，恢复安定的生活，保佑他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免遭涂炭。关公具有的忠义思想、高超武功，甚至其一生转战四方，只是晚年才稍稍安定，镇守荆州，其死后又被弄得身首异处的悲壮人生，自然满足了他们这种心理需求。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出现为关公崇拜文化的兴起创造了思想条件，尤其是北宋道教广泛传播与发展。北宋时期，道教的发展还要归于统治者的重视，其中的原因是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周世宗后室，从法统上说，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其本人对此也是耿耿于怀。在“君权神授”的年代，宋太祖试图从上天意志上进行修正，便利用道士张守真等人宣扬兵变是上天的意志，以求权力获取的合法性。这样，道教便成为了北宋统治者的宠儿。宋真宗为了保全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将道教的崇奉又推向了高潮。为了寻求“澶渊之盟”失败的借口，掩盖自己的无能，他利用道教假借上天意志制造假象。如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命道士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等。这样，各地道教宫观就持续修建，使道教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显然，这种背景为关公崇拜文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到北宋中期，关羽的地位明显有所提高。

北宋社会大量无产者游民的出现，又是关公崇拜文化兴盛的一大原因。由于两宋时期实行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很多自耕农由于土地被豪强地主吞并，便成为脱离主体社会的游民；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人地矛盾紧张，下层农民占有土地数量日渐减少，天灾人祸的发生，使生计艰难的农民沦落为游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游民成为两宋社会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是不仅不受社会宗法制度的束缚，游离于社会法制之外，还形成自己特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受雇于人，乞讨，甚至打家劫舍、偷盗等，生活异常艰难。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在变成游民，闯荡江湖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所以，寻找其他个体帮助，组建各种组织和帮会，成为赖以生存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英雄崇拜意识，“这些英雄形象高大勇武，无所畏惧，重朋友，讲义气而且与游民有大体相同的地位和生活经历”。历史上的关羽则暗合了这种游民文化意识。首先，他曾“亡命奔涿郡”，奔走于江湖；其次，关羽武艺超群，敢于冒险，生性尚武；再次，关羽与结拜兄弟，肝胆相照，忠心耿耿，并肩战斗等，一身江湖义气。显然，关公就成为众多“江湖”游民崇拜的对象。

两宋市民文化的发展又是关公崇拜文化兴盛的另一原因。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使得城镇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在城市商业繁荣的前提下，两宋出现了大量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北宋时的汴京，宋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城八厢总计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这些市民在商业往来、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追求精神世界的愉悦。为了满足这些新兴阶层的精神需求，很多繁华市镇开始出现专供市民阶层消遣的文化，其中三国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成为文艺表演的重要部分，当然，这也包含了关羽本人。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广泛创作和传播，对关羽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关羽开始受到普通民众的追捧，“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另一方面，社会对关羽的尊崇也影响到了上层社会。在北宋时期，关羽先后被封为“忠惠公”、“照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

文化崇拜现象的发生都会遵循一定的因果规律，绝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揆度历史，由表及里，文化崇拜的发展过程，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多种因素下共同作用的产物，有的存在长远，有的短暂，有的易被察觉，有的易被忽略。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由于文化具有持久深远和潜移默化的特殊功能，文化崇拜都或多或少地对某一阶段的人类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先进的文化崇拜会促进社会发展，相反，落后的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显然，注重文化崇拜现象的总结与思考，探究文化崇拜现象的根源，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春秋